

从“类本质”到“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主体观的变革

——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的对比分析

丁宇洋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3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16日

摘 要

马克思主体观的变革与深化是理解其哲学革命的一条重要内在线索。在《手稿》中，人的本质被预设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而《提纲》以“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将人的本质重新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两个文本在核心范畴、人的本质规定、论证逻辑与理论目标四个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以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性的丧失，确立了人的解放的价值指向；后者则以实践观和社会关系论重构了马克思主体思想的理论基础，使人的解放从哲学论证走向革命的实践。然而，这种转变并非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认识论断裂”，而是一场深刻的“扬弃”。《提纲》在保留并提升《手稿》异化批判价值内核的同时，否定了其思辨人本学的论证形式，从而在问题意识深层连续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超越，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体思想从思辨人本学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图景。

关键词

马克思，类本质，社会关系，主体，实践

From “Species-Essence” to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Subjective 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ses on Feuerbach*

Yuyang D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epening of Marx's conception of the subject constitute a crucial internal c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brought about by Marxist theor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bbreviated as "Manuscripts"), human essence is presupposed as the "species-essence" of "free and conscious activity". By contrast, in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abbreviated as "Theses"), with "objective activity" as its core, human essence is redefined as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two texts in four dimensions—core categories, the determination of human essence, argumentative logic, and theoretical aims. The former, through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reveals the loss of subjectivity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human emancipation; the latter, through the theory of practice and social relations, re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rx's thought on the subject, moving human emancipation from philosophical argumentation to revolutionary practice. However, this transformation is not an "epistemological break" in the sense of Althusser, but rather a profound "sublation". The "Theses" retains and elevates the core of the alienation critique in the "Manuscripts", while rejecting its speculative humanistic argumentative form. Thus, it achieves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deep continuity of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the two texts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the complete trajectory of Marx's thought on the subject from speculative humanism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Karl Marx, Species-Essence, Social Relations, Subject, Practi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马克思的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体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理论转向与实践关切：在理论上聚焦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现实中则深入拓展到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劳动、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场域，探寻主体性实现的新路径。

在马克思主体思想形成史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占据着关键位置。《手稿》指出“人始终是主体”([1], pp. 195-196)，侧重于在“类”的层面探寻主体的理想性本质，《提纲》则转向在现实性上分析主体的社会-历史性构成。尽管路径迥异，但二者共享同一根本关切——如何理解和实现人在现代世界中的主体性及其解放。两部著作成稿前后相隔不过一年，在主体观上却呈现出显著差异。也正因如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学者持“转换说”，认为从《手稿》到《提纲》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发生了根本转换([2], p. 58)；有学者持“借代说”，强调二者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3], p. 49)；亦有学者提出更为辩证的理解，认为二者因共同对“人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的关切，而在“逻辑和观点具有严格的一致性”([4], p. 40)。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两个文本在主体观上的核心观点，并围绕其核心范畴、人的本质规定、论证逻辑和理论目标四个维度对两个文本进行系统对比，进而在承认马克思主体思想深刻变革的前提下，论证其转变的连续与超越性质，以“扬弃”回应其发展中的“断裂”与“超越”问题的学术争论。

2. 主体之为“类本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体构想

《手稿》中的马克思主体思想围绕“劳动”这一核心范畴展开。马克思首先将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进而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性的全面丧失，最后在共产主义中展望主体本质的重新占有，呈现为“本质设定－对象化确证－异化丧失－扬弃复归”的逻辑结构。

2.1. “类存在物”的概念谱系：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双重变奏

理解《手稿》中主体作为“类存在物”及其“类本质”，需要回溯这一概念的思想谱系。一方面，“类本质”术语的直接思想来源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用“类”概念标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只能将个体作为对象，人却能“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5], p. 33)，由此人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另一方面，《手稿》中“类本质”概念虽然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外壳，但在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介入下，其内核已发生了位移。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把“劳动的本质，是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 p. 205)。这也意味着费尔巴哈是从意识出发界定人的类本质，黑格尔则将劳动视为人的自我生成过程。

马克思在《手稿》中继承并重构了后一思路，将人的“类特性”重新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 p. 162)，即“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 pp. 162-163)。这表明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不是静态的意识，而是动态的劳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普遍性与自由品格，且指出这种自由普遍性是在人与动物的生产活动差异中得到了生动呈现。

由此，《手稿》的“类本质”概念呈现出双重思想谱系的内在张力：表层的术语体系来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深层的动力机制则来自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重构。这一张力决定了《手稿》主体构想的独特面貌——它既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将劳动限定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 p. 205)，而是被赋予了全新的实践内涵，试图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批判中展开对现实劳动者的生存论分析。然而也应当看到，《手稿》中的类本质概念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先验设定色彩——它以“自由自觉”为人的本真规定，再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和批判现实，在论证结构上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逻辑轨迹，并借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外在形式。这一理想化预设与异化劳动批判中展开的现实历史分析之间，构成了《手稿》中马克思主体思想深层的结构性张力，也正是这一张力推动马克思走向新的理论地基。

2.2. 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与丧失：对象化与异化

在确立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人的类本质之后，《手稿》通过“对象化”概念，阐明了其本质的实现方式。人通过劳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物化在产品中，从而在自身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正是在此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不仅是产品的创造，更是人的自我确证，用马克思的话说，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 p. 163)。因而《手稿》中主体自我确证的方式，已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精神运动。

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活动遭遇了根本性的扭曲，不再是其本质的实现，而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 p. 157)。马克思由此展开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主体与自身本质的疏离，具体表现为：

其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产品本应是主体本质的确证，却成为敌对的统治力量。“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越贫穷”([1], p. 156)。主体在对象世界中看到的不是自身，而是异己的权力。其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本应是目的性的生命实现，却沦为维持生存的强制手段。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1], p. 159)，生命活动降格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1], p. 160)。其三，人与类本质的相异化。作为目的的自由活动被贬为单纯手段，人的本真生命随之丧失。人执行属人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1], p. 160)，动物性的生存反倒被错认为自由，主体与自身类本质全面分裂。其四，“当人与自身相对立，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 p. 163)。上述各种异化状态的直接结果，便是人与人相异化。

通过这四重规定，异化劳动理论完整地呈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主体如何陷入一种全面的自我丧失——“真正的人的类本质和现实的人的存在相对立”([6], p. 165)的生存困境。正是这一诊断，使扬弃异化向人的本质复归，成为《手稿》不可回避的逻辑结论。

2.3. 主体性的丧失与复归：异化的扬弃

如果异化劳动构成了对人的类本质的否定，那么扬弃异化、向其本质复归便成为历史的必然指向。在《手稿》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论述部分，马克思给出了主体解放的方向，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 p. 185)。马克思同时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 p. 182)，这也意味着异化的扬弃是在现实历史运动中完成的，而非道德理想的简单投射。

马克思在此严厉批判了从粗陋的到空想的多种共产主义形态，指出它们或留恋于物，或不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与之相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被规定为积极扬弃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从而实现人对自身主体本质的真正占有([1], p. 183)。这一规定在价值取向与逻辑起点上已根本区别于空想学说。然而，就论证方式而言，此时对“扬弃”的把握仍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它从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出发，将扬弃视为向自由自觉劳动的抽象本质的复归。同时，“积极扬弃”尚缺乏从私有财产内在矛盾中生长出来的现实中介与具体实践形式，更像存在论层面的一次跳跃式克服，而非由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变革承载的实际历史进程。正因如此，《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虽提供了深刻的人文价值定向，却仍处于从哲学思辨向历史科学过渡的理论关口——而正是这一内在张力，推动马克思走向新的理论地基，为《提纲》的实践转向埋下了伏笔。

3.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主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主体观革命

《提纲》是马克思主体思想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标识。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范畴，以批判费尔巴哈为中介，从主体的理解方式、本质规定、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到思维的实践检验和行动的根本指向等多个方面，重构了马克思主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3.1. “对象性活动”：从人本学到新世界观的实践概念

《提纲》第一条便直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 p. 499)。

一方面，马克思将“感性的人的活动”与“实践”等同起来，这意味着实践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另一方面，马克思将“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作为唯物主义的新要求，这意味着唯物主义不必也不能排斥主体性，关键是赋予主体性以感性的、现实的根基。

“对象性活动”这一术语在两个文本中的不同命运，恰好折射出思想的深层转变。在《手稿》中，“‘对象性活动’服务于人本学的哲学逻辑建构”([7], p. 58)——它旨在说明人如何实现和确证其先验设定的“类本质”，这是一种从“主体本质”到“活动”的因果关系。而在《提纲》中，“对象性活动”被赋予了优先性和第一性：它本身就是人的现实存在，不再服务于任何先验本质的说明，“其核心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人本学设定，而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指向的现实的经济社会实践”([7], p. 58)。人“是”什么，直接取决于他“如何”进行对象性活动。这便完成了从“主体本质—活动”的因果关系向“活动—主体本质”的生成关系的根本倒转。《提纲》中的实践概念吸收了《手稿》中劳动概念的全部感性现实性，同时又克服了后者带有的思辨残留，获得了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定，成为统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范畴。

3.2. “社会关系的总和”：主体本质及其生成的历史规定

如果说《提纲》第一条确立了实践的基础性地位，那么第六条则将主体问题的讨论推向了社会历史层面。马克思在此并非要给人的本质下一个永恒的定义，而是确立了一种把握人的现实存在的方法论原则，即必须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结构出发去理解人的生存状态。与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1], p. 501)不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501)。这标志着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根本性突破。它不再从一个先验的“类”出发规定人的本质，而是将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来把握，使人的本质获得了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从抽象的人本学范式转向了社会历史范式。

《提纲》第三条进一步阐明了主体生成的历史维度，即人与环境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 p. 500)。人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塑造，也不是独立于环境之外的先验存在，而是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同时改变自身。

至此，主体的生成就不是一次性的“复归”，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改造自身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主体既不是被动接受外界刺激的容器，也不是凭空创造世界的绝对精神，而是在与对象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生成和重塑自身的感性存在。

3.3. 改变世界：主体行动的根本指向

《提纲》第十与第十一条以高度凝练的语句宣告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指向。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而它们所预设的主体始终是与世界相分离的旁观者。费尔巴哈将主体理解为感性直观的主体，但这种直观恰恰是非历史的。当主体仅仅直观世界时，世界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完成了的、既成的对象，历史和变化不在他的视野之内[8]。与之相对，“改变世界”将主体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地平线上。“改变”不仅意味着主体对世界的能动作用，更意味着主体自身在这一过程中被改变。这一双向运动的建立，标志着《提纲》完成了从“认知主体”到“实践主体”的根本性变革，“把握到主体与客体在感性实践活动中的相互生成关系，有效克服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分困境”([9], p. 49)。主体也因此具有了鲜明的革命性和行动性，不再是《手稿》中被异化劳动所压迫的苦难主体，而是承担着“革命的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化的人类”的自觉成员。

4. 变革中的连续：马克思主体观的四重维度再审视

从《手稿》到《提纲》，马克思的主体思想在核心范畴、人的本质规定、论证逻辑和理论目标四个维度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必须强调的是，揭示这一转变，不是为了将二者割裂为“不成熟”与“成熟”的二元对立。相反，作为一种扬弃，马克思主体思想在二者间的变化体现为在问题意识深层连续基础上实现的理论超越。以下从四个维度分别论述变革的表现与连续性的内在逻辑。

4.1. 核心范畴：从“劳动”到“实践”的扬弃发展

《手稿》的核心范畴是“劳动”，人的类本质与异化的扬弃均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相关([1], pp. 161-163); 而《提纲》则以“实践”取代“劳动”，使之成为统摄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范畴。实践比劳动更具包容性，不仅涵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包含改造社会关系的革命活动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感性活动，使主体的活动领域从生产劳动扩展到其全部的社会历史活动。

然而，这一范畴转换并非简单的词语替换，而是思想扬弃发展下的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使用了“对象性的活动”这一概念，指出人不仅能在精神上，也可以“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1], p. 163)。《提纲》中的“实践”正是这一“对象性的活动”的进一步提升和普遍化。在这一意义上，《提纲》的“实践”扬弃了《手稿》中的“劳动”概念：它在继承劳动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性内核的基础之上，剥去了其在《手稿》中服务于“类本质”说明的思辨外壳，并赋予其社会历史普遍规定性。由此，《手稿》中关于劳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分析，为《提纲》的“实践”概念提供了经验基础；而《提纲》则将这一分析提升为新世界观的出发点。

4.2. 人的本质规定：从“类本质”到“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方法论升华

《手稿》从人的内在固有属性出发，将主体本质规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一个以“应有”为标准的理想性规定([10], p. 23)。《提纲》第六条则将主体本质的规定从内在属性转向外在关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501)。这一转换使主体从一个具有先验本质的实体，转变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中不断生成的过程性存在。

这一转换同样不是对《手稿》的简单否定。作为一种扬弃，《提纲》保留了《手稿》对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其本质相异化的深切人文关怀，但否定了其先验人本学的理论前提，转而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入手科学地说明这种异化的根源。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提纲》第六条的命题“并不是马克思肯定性的价值判断”([11], p. 32)，而是对人在特定社会中的现实规定性的方法论说明。换句话说，这一方法论转向，为批判《手稿》所揭示的现实异化关系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的总和”表现为物化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总和，这正是《手稿》异化状态的真实根基。《提纲》延续了《手稿》的异化批判精神，只不过不再从先验本质出发去批判现实，而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去揭示人的生存困境。此外，“复归”在《手稿》中并非简单地回到原始状态——马克思明确强调这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与建立在全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完全的复归”([1], p. 185)，其深刻的历史感已为《提纲》的实践变革打开了逻辑缺口。

4.3. 论证逻辑：从“异化－复归”到“实践生成”的历史化推进

《手稿》的逻辑结构可概括为“本质设定－异化丧失－扬弃复归”，以先验设定的理想状态为参照批判现实，再将理想状态的复归作为历史的目标。《提纲》则抛弃了这一论证方式，不再从“人应当是什么”出发去批判现实，而是从“人现实的是什么”出发去把握人的存在状况，其逻辑结构也据此转变为“实践活动中生成－社会关系中被规定－革命的实践中自我改变”。历史成为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

本身，不再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

这一论证逻辑的转变，同样是《手稿》内部历史性原则在“扬弃”中彻底化的结果。《手稿》明确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 p. 182)，并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 p. 192)。这意味着，马克思在《手稿》中已模糊地意识到，人的本质力量正是在异化的、对象性的活动中得到发展、丰富和确证的。人最根本的现实性，是由其在社会物质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因此，“复归”逻辑的内部，已经生长出一种“发展”的逻辑。在这一意义上，《手稿》已经将人的本质的实现视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而非简单的先验预设。异化扬弃的过程性、工业文明的生成性，这些历史性原则已经内置于《手稿》的理论逻辑之中。只不过，这些具有突破潜力的理论元素仍被包裹在思辨人本学的论证框架内。《提纲》的贡献，是将这些内生性的历史原则从思辨外壳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了“革命的实践”这一彻底的、科学化的表达形式。因此，《提纲》的新主体观并非对《手稿》“异化劳动”经济分析的外在超越，而是其内在的哲学升华和一般化。

4.4. 理论目标：从哲学论证到改变世界的实践筹划

《手稿》与《提纲》都以人的解放为终极关切，但在如何实现解放的问题上，后者实现了从哲学论证到实践筹划的推进。在《手稿》中，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带有浓厚的哲学论证色彩，它被理解为“历史之谜的解答”([1], p. 185)，但从现实运动通达解放的具体路径尚未得到深入分析。而《提纲》则明确宣告“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 p. 502)。理论的任务从揭示异化的根源转变为指明变革的现实道路，主体从被异化所困的苦难形象转变为承担历史变革的实践力量。

这种推进恰恰是《手稿》解放旨趣的深化而非抛弃。科尔纽指出，《手稿》包含“两个基本主题——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和这种异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克服”([12], p. 137)。这一主题不仅贯穿《手稿》和《提纲》，也是马克思此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全部理论工作的核心。《提纲》“改变世界”的宣告，正是《手稿》中寻求“扬弃异化”这一革命冲动在扬弃逻辑下的科学化表达：它保留了批判异化、寻求解放的革命内核，但否定了向理想化的“类本质”复归的哲学论证，将这一革命冲动从人本学预设中解放出来，置于变革现实社会关系的实践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提纲》的“实践”概念提供了经验基础，而《手稿》中关于劳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分析在《提纲》中被提升为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因此，《提纲》与《手稿》的关系，是“扬弃”而非简单的否定或延续，是已有突破潜力的理论元素在新的概念地基上的全面展开。二者的关系可界定为：前者提出了问题，找到了批判的对象，确立了主体解放的价值方向；后者找到了切入问题的方法，确立了实践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改变世界的现实道路。两个文本在问题意识和思想高度之间存在着可辨识的推进线索([13], pp. 12-14)，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体思想从思辨人本学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图景。

5. 结语

从《手稿》到《提纲》，从“类本质”到“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主体思想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性转变，其实质是以实践概念为枢纽，揭示了主体由社会关系建构并在实践中自我变革的历史辩证法。这一转变的理论史意义，在于对近代意识哲学主体范式的颠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主体哲学，无论是“我思”还是“绝对精神”，主体始终被理解为某种意识实体。费尔巴哈虽在唯物主义方向上有所突破，但他的“感性主体”仍然停留在直观层面，其所理解的人的感性活动是理论性的而非实践性的。

马克思则将主体从意识领域拉回到感性的、实践的生活世界，从根本上将主体与劳动、主体与社会关系内在关联在一起，由此将哲学的出发点从意识的内在性转向实践的社会性，实现了对西方近代主体哲学的深刻变革。

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审视这一思想变化历程，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一方面，这内在回应了将马克思主体思想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的误读，恢复了马克思思想中丰富的主体性维度。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观应用于当代，也能为批判数字劳动中的主体异化新形式提供锐利视角。这意味着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主体性困境并非源于对某种理想化的数字劳动本质的背离，而应被理解为算法技术架构与平台资本逻辑所构建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结果。因此，主体的解放也不应诉诸向“本真劳动”的复归，而在于以实践变革打破资本增殖逻辑下新型技术关系对劳动主体性的侵蚀^[14]。另一方面，它也为当代主体性危机的哲学反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例如，在生态危机下的主体责任反思中，马克思主体思想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基点——即主体并非外在于自然的“类本质”的占有者，而是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实践中，由现实社会关系建构的历史性存在。因而，无论是“深绿”思潮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乌托邦色彩的主张，还是“浅绿”思潮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下的改良方案^[15]，都因对主体及其行为的非历史理解而陷入理论与实践困境。生态危机的根源不能简单归咎于某种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应追溯到使特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得以运行的社会形态中。相应地，生态责任的承担者与变革力量，也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的分析中才能被识别与确立。

马克思主体思想至今仍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下主体异化的理论利器。在这一视野中，人的解放不是向某个预设本质的“复归”，而是在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中不断开辟新的可能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沿着两个方向继续深化：其一，深入挖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主体思想，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社会个人”的论述，探讨主体如何在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形式的批判中被历史地重构；其二，将马克思主体观的变革置于更广阔的当代批判理论对话中，辨析其与生命政治批判、承认理论等思潮在处理主体问题上的异同，从而进一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主体观在当代的独特解释力与革命性潜能。马克思在《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 506——这正是其为把握主体问题所提供的根本实践定向。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张一兵. 关于马克思哲学逻辑转换中三个难题的深层解决[J]. 江苏社会科学, 1993(5): 58-63.
- [3] 丛大川. 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J]. 晋阳学刊, 1996(4): 45-53.
- [4] 朱宝信. 从《手稿》到《提纲》: 既非“转换”亦非“借代”——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一致性论辩[J]. 理论探讨, 1998(5): 37-40.
- [5]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荣震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5.
- [6] 孙伯鍨.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7] 张义修. “实践”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内涵及其转变——一项从人本学到新世界观的概念史考察[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8, 39(2): 58-63.
- [8] 林青.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历史维度[EB/OL].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05-22 https://www.cssn.cn/zx/mkszyzx/202505/t20250522_5875249.shtml, 2026-06-02.
- [9] 苏红豆.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与马克思的主体性革命——从“异化劳动”“感性实践”到“全面生产”的概念嬗变[J]. 教学与研究, 2023(8): 49-56.
- [10]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第四版.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
- [11] 盛福刚. 青年马克思与唯物史观的形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注疏[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3(6): 29-32.
- [12] 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 第二卷: 1844-1845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5.
- [13] 林锋. 重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与地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J]. 湖南社会科学, 2020(1): 8-15.
- [14] 王毅. 数字劳动异化的“主体性危机”及其超越路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J/OL]. 系统科学学报: 1-11. 2026-05-26. <https://link.cnki.net/urlid/14.1333.N.20260525.1342.002>, 2026-06-15.
- [15] 王雨辰. 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环境正义维度[J].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20(1): 3-15.